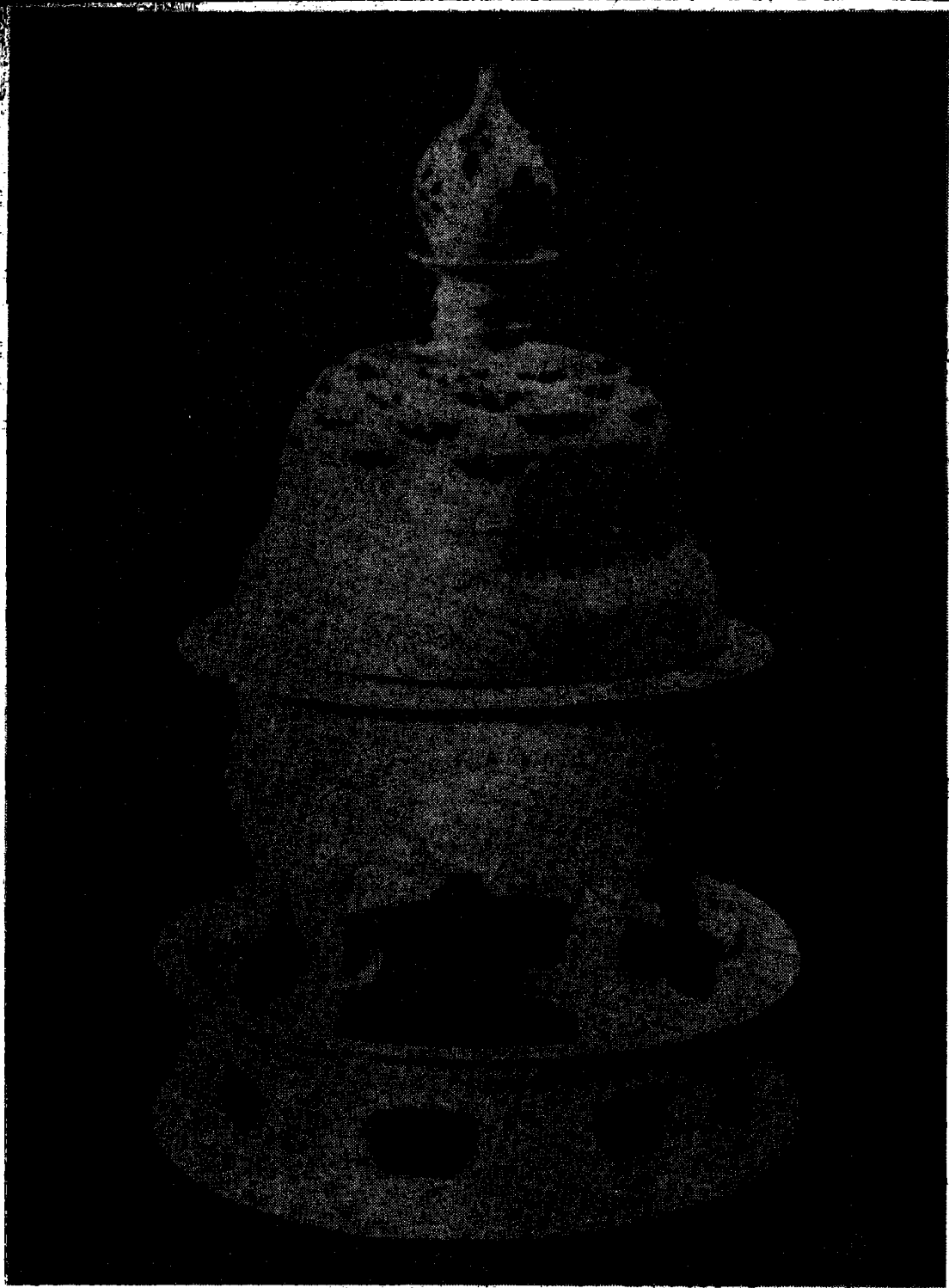


第三辑

中国古陶瓷研究会
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会刊

中国古陶瓷研究





东晋青瓷佛像

ISBN

7-309-04111-1

目 录

- 浙江古代瓷器的研究 朱伯谦 (1)
- 乌龟山南宋官窑产品类型及分期 陈元甫 (4)
- 瓯窑探略 金柏东 (12)
- 六朝瓯窑瓷器 蔡钢铁 (18)
- 越窑青瓷与人类文明 李毅华 陈定荣 (29)
- 浙南瓷业遗存类型初析 任世龙 (33)
- 《“东瓯缥瓷”驳证》的驳正 熊 寥 (40)
- 浙江宁波东钱湖窑场调查与研究 林士民 (47)
- 浙江加彩瓷器的研究
——兼谈釉下彩起源及相关问题 阮平尔 蔡乃武 (54)
- 浙江湖州古窑址调查 任大根 陈兴吾 (63)
- 隋唐德清瓷窑址初探 朱建明 (72)
- 漫谈衢州古代瓷窑 李志耀 (79)
- 综谈元代瓷器窖藏 桑坚信 (86)
- 论赣州七鲤镇古瓷窑 陈定荣 (93)
- 福建松溪唐宋瓷窑的探讨 林忠干 赵洪章 (100)
- 牙买加发现的德化“中国白” 龚国强 (108)

ANCIENT CHINESE CERAMICS

No. 3

Main Contents

- A study of ancient porcelain of Zhejiang Province..... Zhu Boqian
The types and periodization of the products of Guan Yao (kiln) in Wugui-
shan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Chen Yuanfu
A study of Ou Yao ware Jin Bodong
On the celadon of Yue Yao (kiln)Li Yihua Chen Dingrong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remains of porcelain industry in
the South of Zhejiang Province Ren Shilog
A study of the green porcelain with added brown colour of Zhejiang Provi-
nceRuan Pinger Cai Naiwu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e porcelain hoarding in the Yuan Dynasty
..... Sang Jianxin
Dehua "Blanc de China" discovered in Jamaica Gong Guoqiang

浙江古代瓷器的研究

朱伯谦

一、繁荣的浙江古代瓷业

浙江地处我国东南沿海，境内山岭连绵，河流纵横，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经济文化十分发达。早在七千年前，在宁绍和杭嘉湖平原分别创造了灿烂的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发展到四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有了成熟的犁耕农业，精美的黑陶和丝麻等纺织手工业，以及雕琢精细的大量玉器。其中玉制的琮、钺、璧等礼器是财富和神崇拜的象征。它们在墓中的出现，反映死者生前集财权、军权、神权于一身的历史事实，也说明社会形态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显示了中华文明曙光的出现。继此不久，即在商代中晚期，创造成功了用瓷石作胎，外施薄釉的原始青瓷；到了东汉又烧制成功青瓷和黑瓷，浙江成为我国瓷器的主要发源地。从此以后，瓷业迅速发展，窑场遍布全省各地，出现了越窑、瓯窑、婺州窑、南宋官窑和龙泉窑等历史名窑。到目前为止，全省已发现各个时期的瓷窑遗址多达1700余处，是古窑址发现最多的一个省。而且各瓷窑作坊都用装烧量很大的龙窑烧瓷，产量很大，所以浙江又是我国古代主要产瓷区之一。同时自东汉至宋，在青瓷制造工艺上一直趋于领先地位，瓷器质量高，受到国内外广大消费者的喜爱，产品远销亚非欧三大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为促进中外人民之间的友谊和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为了保护这份珍贵遗产，各级政府对保存比较完整、研究价值较高的瓷窑遗址分别公布为省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其中慈溪上林湖越窑遗址和龙泉大窑龙泉窑遗址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妥善的加以保护和利用。

二、陶瓷考古的丰硕成果

有关浙江古代的瓷窑，在唐代以来的文献中有些零星的记载，是我们研究陶瓷史的重要资料。但是对瓷窑进行科学考察却是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的。从开始至今根据考察的形式和要求，可分为三个阶段。

1. 对瓷窑进行实地调查阶段

龙泉窑是我国宋元时期的名窑，在本世纪初就受到古董商的青睐，很多人到龙泉收买瓷器和瓷片，煽动当地群众挖掘龙泉青瓷，使龙泉窑址和古墓葬受到严重的破坏。为了了解龙泉窑的真实面貌，陈万里先生于1928年首次到丽水、龙泉县调查龙泉窑址。在调查前注意收集文献资料，调查时注意窑址的地形地貌，遗迹遗物，历来出土文物情况和原料产地等。以

后，在三四十年代又对龙泉窑作了多次的调查和复查，尤其是对大窑、金村、溪口、竹口、道泰等重点窑址进行了反复的调查。

与此同时，对绍兴县九岩、王家楼，余姚县上林湖等越窑窑址也作了多次调查研究，获得大量的实物资料，并编写了《瓷器与浙江》、《越器图录》等专著，成果很大。陈万里先生是浙江古代瓷器研究的先驱者和开拓者。

此外，中国古陶瓷科学技术研究的创始人周仁先生在1930年至1932年先后三次到杭州乌龟山等地考察南宋官窑窑址，撰写了《发掘杭州南宋官窑报告书》；1936年朱鸿达在调查采集乌龟山窑址标本的基础上，编著出版了《修内司官窑》一书。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党和国家对文物考古事业的重视，陶瓷考古不断得到发展。五六十年代故宫博物院陈万里、冯先铭等先生常来浙江带领我们考察越窑、瓯窑、婺州窑和龙泉窑窑址。这些考察活动，使我们掌握了古窑址的调查方法，学到了陶瓷的基础知识，为浙江的古陶瓷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文物普查和众多的基本建设工程中陆续发现了一批瓷窑址。其中比较重要的有萧山县进化区东周原始瓷窑址，上虞县窑寺前、鄞县东钱湖越窑窑址，德清县城焦山、城山、小马山德清窑窑址等。

由于仅限于窑址的地面调查，这个阶段了解的资料受到局限。

2. 开展对瓷窑遗址进行局部发掘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除对瓷窑遗址进行普遍调查外，还对重点窑址特别是瓷窑进行小规模的部分发掘。

1956年为了了解宋代名窑——南宋官窑的情况，对杭州乌龟山窑址南部已经暴露的一条龙窑作了发掘，并获得大量的瓷片和窑具。该窑长23.5米，保存较好，为研究南宋官窑窑炉结构，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1959年为配合瓯江水利工程，对丽水、云和和龙泉东区瓯江两岸，进行文物普查，新发现大批龙泉窑窑址，包括丽水县吕步坑南朝至唐代龙泉窑早期窑址。同时对保定、吕步坑窑址的龙窑进行发掘。

为了研究龙泉青瓷的历史，汲取精华，古为今用，1959年浙江省轻工业厅组织有关单位对历史名窑——龙泉窑进行总结，并试图恢复和发展生产，在龙泉县大窑、金村有重点地作了发掘。在金村发掘相互叠压的宋代龙窑2座，在大窑除发掘龙窑7座外，还发掘了废品堆积层和部分作坊遗迹。

这是本省瓷窑考古的第二阶段，除对窑址进行普遍调查外，还注意对窑炉的发掘，为研究龙窑结构、装烧工艺（包括窑具的种类和使用方法）、产品种类等提供了实物资料。同时早晚窑床的叠压关系和窑内遗留的未经扰乱的遗物是研究该窑址早晚产品及其演变的重要资料。与第一阶段相比，考察的范围扩大了，获得的资料丰富了。

3. 注意对瓷窑作坊遗迹的全面发掘

1977年由我国硅酸盐学会召集的《中国陶瓷史》编写工作会议，研究了《中国陶瓷史》的编写提纲；次年，又在浙江金华召开《我国古陶瓷学术会议》，在会议期间成立了《中国陶瓷史》主编小组。这几次重要会议，大大地推动了浙江古陶瓷的研究工作。为了收集编写《中国陶瓷史》的资料，我们对上虞县已发现的三百余处古窑址作了全面的调查，并选择上虞联江乡帐子山、鞍山等东汉、三国和晋代窑址作了小规模的部分发掘，清理这时期的龙窑4座。

1979年至1981年为配合云和县的紧水滩水电站工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和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共同组成紧水滩工程考古队，对水库淹没区内的龙泉窑窑址有重点地进行抢救性发掘。为了全面了解龙泉窑的生产情况，注意和强调了对瓷窑遗址的全面发掘，瓷窑和工场等并重。在龙泉县山头窑、大白岸、安福金坝坨、金蚕湾、石大门山和源口窑址的发掘中，发现了瓷器生产过程中的全套设备。其中有淘洗池、沉淀池、干燥池、练泥池、贮泥池等瓷土加工处理的各种遗迹；有拉坯成型的工房，房内有拉坯用的陶车、修坯用的辘轳遗迹；有素烧上釉用的素烧炉、釉桶；有建造在山坡上的龙窑和分室龙窑；有窑工居住的简易工房；有连接淘洗池、沉淀池的水沟和通往龙窑、场房的道路等等。总之，从胎釉原料加工、成型、修坯、素烧、上釉到正式入窑烧成的一整套制瓷生产设备，都被发现和揭露出来。为研究龙泉窑窑场的规模、布局、生产工具、设备、工艺流程、生产能力和交通运输等提供了真实的资料。在废品堆积层的发掘中，根据早晚堆积层出土的瓷片和窑具标本，经过类型学的排比，结合墓葬等有关资料，又可以判断窑场的烧造年代和产品的发展演变情况。

1985年冬至1986年春，临安城考古队对乌龟山南宋官窑遗址进行了第二次的全面发掘，获得了大量瓷片标本和作坊遗迹。在作坊遗迹中有练泥池、三开间的成型工房、修坯用的辘轳、素烧炉、釉缸、龙窑和排水沟、道路等等，为研究南宋官窑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在此期间各市县通过文物普查，又发现大批瓷窑遗址。其中在德清、吴兴两县发现一批商周时期原始瓷窑址群；在德清、临海分别发现东汉至唐和东汉至宋的瓷窑群等等，为研究浙江瓷业史提供大量新的资料。

同时，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等科研机构对越窑、龙泉窑、南宋官窑和德清窑的瓷片的胎釉化学组成、显微结构、烧成温度等等作了大量的研究分析，为各个瓷窑历代产品的胎釉配方，生产工艺等提供了确切的数据和科学的结论。

在综合研究中，还对各瓷窑体系的形成，主要产品器形的发展演变，历代产品的特征，器物的命名、用途和瓷业兴衰等原因，也提出一些新的意见，使本省瓷器的研究达到了新的更高的阶段。

三、浙江古瓷研究前瞻

瓷器是一种经济实用、价廉物美的人类生活的必需品，它与人们的生活关系十分密切。瓷器的花式品种、造型、装饰，胎釉的厚薄与色泽和人们的经济文化水平、生活习俗、爱好与社会风尚都有密切的关系。瓷器又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之一，在中外的经济文化交往中起着一定的作用。所以，需要重视历史和有关文献的阅读，使瓷窑考古和文献资料很好地结合起来。同时需要对杭州、宁波等对外贸易城市和杭州港、象山港、温州湾等海口进行必要的水下考古，调查海底陶瓷器，并广泛收集世界各国出土中国瓷器的资料，以便全面地、综合地从风俗、艺术、经济、中西交通等多方面研究浙江古陶瓷。

乌龟山南宋官窑产品类型及分期

陈元甫

南宋官窑为宋代中国瓷业发展高峰的杰出代表，长期以来受到中外陶瓷研究者的重视。位于杭州市南郊的乌龟山窑，自二十年代被发现以来，已被确认为郊坛下南宋官窑。该窑址先后经过1956年和1985年两次科学发掘，除发现两条龙窑窑基和一处比较完整的工场遗迹外，还出土了数以万计的瓷片、素烧坯和窑具等实物标本，为全面揭示乌龟山官窑的产品特征，开展南宋官窑有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可靠的实物资料。本文拟以考古资料为基础，探讨有关该窑产品的类型及分期问题。^①

—

成书于南宋时期的《坦斋笔衡》和《负喧杂录》两书中，记述南宋官窑的窑址先后有修内司和郊坛下两处，但就产品特征和制品类型，仅对修内司窑有“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彻，为世所珍”这样比较具体的描述，而于郊坛下窑却缺乏明确的记载，只是留下了“比旧窑大不侔矣”的叹息。在元明以后的文献中，也不见郊坛下官窑的踪影。自本世纪二十年代该窑址在乌龟山被发现以后，直至五十年代初，一些致力于探索南宋官窑的学者，不断地到窑址实地进行调查和采集。但从中获取的材料有限，只能对乌龟山官窑的产品作些笼统的概述，有些不免有片面之处，远不能在制品类型和早晚分期等问题上加以阐述。

1956年对乌龟山官窑进行了第一次科学发掘，龙窑窑基的发现和大量官窑实物标本的出土，使该窑的真实面目开始大白于天下，为以地下实物资料研究南宋官窑提供了可能。尤其“在堆积层中发现了高低两档产品”^②，发掘者据此认为乌龟山南宋官窑的制品存在着高（精）、低（粗）两种类型。这一高低两档产品的区分，无疑是研究乌龟山官窑制品类型的良好开端。1985年的第二次大面积发掘，新发现龙窑窑基一处，揭露出一组较为完整的工场遗迹，出土数万件瓷片和窑具标本，为全面揭露乌龟山官窑的面目提供了更加丰富、更加详实的资料^③。但在这次出土的瓷片中，不见那类“低档产品”，那种“胎质粗厚，制作不精，釉层薄而呈黄褐色，产品仅见碗一种，内壁有粗放的刻划花草纹。由于一个匣钵内放有数碗叠烧，碗内常有圆圈状旋釉”的制品^④，仅在靠近1956年发掘的窑基下方的探沟中出土几片，而探沟中的地层均已遭晚期严重扰乱。因此，考虑到受出土数量等方面的材料限制，笔者在本文讨论中暂不把这类低档产品纳入其中。

迄今所见乌龟山官窑的标本，釉质晶莹类玉，制品以素面为主，釉面普遍开片。据其施釉特征，可明确分为一次釉和多次釉两类不同制品。

一次釉制品釉层相对显得较薄，未见釉层厚度超过胎壁的现象，从断面观察不到多层釉，所施的石灰碱釉具有一定的乳浊性和玉质感。釉色以青中泛灰者居多，另有一部分为米黄色，真正达到粉青色的瓷片较少。不论器型大小，内外壁釉厚基本一致。制品的胎体也较单薄，坯料中掺和有一定的紫金土，呈现出深灰、浅灰和米黄不同胎色。这类制品在乌龟山官窑中占有较大的比例。

多次釉制品釉层甚厚，厚度多在一毫米以上，在许多残片断面上，肉眼还可以观察到数次施成的多层釉痕迹。丰厚的釉层富有乳浊性，精光内蕴犹似行将透油的脂肪层，具有良好的类玉效果，与一次釉制品有着显著的差异。釉色以粉青和灰青色为多见，少量呈米黄色。虽然高粘度的石灰碱釉耐高温性能良好，在高温煅烧下不易流釉，从而为增加釉层厚度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按照传统的一次施釉工艺，是难以达到上述厚釉效果的。由此可以断定，这类制品是在反复素烧、多次上釉的工艺下烧成的，釉内的分层现象显然与多次上釉有关。1985年素烧炉遗迹的发现，和大量质地松软、色呈土黄的素烧坯残片的出土，都为多次釉制品的制作工艺提供了实物例证。在有的残片上发现仅内壁施釉的现象，表明当时还有可能是单面施釉后素烧，增加坯体的机械强度，然后再行修坯，以便达到最佳的薄胎效果。属于多次釉制品的碗、盘、洗、盆、杯等大口器，往往内外均施多次釉，内外壁的釉层相仿。而在罐、壶、瓶等类小口器上，则可见到仅外壁施多次釉而内壁只施单次釉，外壁釉层厚于内壁的现象。就同类产品相比，多次釉产品的胎体一般较一次釉产品薄，尤其在碗、盘、洗、杯等小件大口器物的口腹部，其胎骨的厚度甚至低于单面釉层的厚度，有的在一毫米以下，达到了壁薄如纸的神奇境界。

与施釉特征相应，在装烧方法上，一次釉与多次釉两类制品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虽然两者均采用匣钵单件仰烧，但所用装烧具却不尽相同。一次釉产品除一些为数极少的罐、壶等大件器和无法采用支烧的器物（如小圈足器、觚等）采用垫具垫烧外，大部分采用通体包釉支钉具支烧的方法，圆形的支钉痕迹往往留在制品的外底，有的甚至有残断的支钉尖与瓷釉粘结在外底。相反，多次釉制品中，虽然也有极少量圈足器和一些无法垫烧的平底器采用包釉支烧，但绝大部分是用各种垫具垫烧的。垫烧器物因足尖直接置于垫具之上，为避免煅烧时与垫具的粘结，装烧前足尖经过刮釉处理，器物的足尖无釉露胎。由于在坯料中掺和较多的藉以衬托釉色的高铁紫金土，在高温煅烧过程中，露胎的足尖在冷却进行的二次氧化中呈现出紫褐色，加之器口部位由于釉汁的流淌，常常隐现出灰或灰黑色的胎骨，这样，在一部分多次釉制品上就明显地形成了“紫口铁足”的特征。

很明显，上述在乌龟山官窑中见到的一次釉和多次釉两类制品，存在着明显的工艺区别。就产品的质量而论，尽管比起其它民用瓷窑的产品来，一次釉制品也显得釉厚胎薄，较为精细，但比同窑的多次釉制品则又逊色许多。

与工艺区别相反，在产品种类上，两类制品差异并不大。碗、盘、洗、盆、杯等日常生活用具，都是两者中的多见产品，而炉、瓶、壶、觚、簋、奩等仿古陈设观服用瓷，不但在多次釉产品中占有相当的比例，而且在一次釉产品中同样可以见到不少实物。

二

在大量出土的标本中，一次釉和多次釉两类制品并非各自独立存在于某几种器型，而是以两者共存的形式出现于各种器型当中。在同一器型中，既可见到一次釉制品，又有多次釉

产品，这是首先可以观察到的一个颇有启发性的现象。这一现象不但表明了两类制品之间进行排比的可行性，而且也一定程度地表明它们之间具有早晚关系的可能。

作为日常生活用具的碗和盘，是乌龟山官窑出土标本中的多见器形，两者的型、式都较丰富。在碗类当中，又以敞口斜腹圈足碗最为常见，它具有口腹斜敞，内底往往有一个压印的小平面，底腹间以一条凹线作为明确分界的形态特征。在此型碗的部分制品之外壁，可见到半浮雕莲瓣纹装饰。根据局部形态的差异，又可区分为三种不同的式样。第一种是口腹较坦张，圈足明显向外卷撇，足径较大，部分器物的外壁刻有瓣面肥大的莲瓣纹，瓣脊外凸不明显，浮雕感弱，用支钉具支烧；第二种圈足较矮，足外壁基本平直，底径略小，支烧和垫烧二者兼存；第三种腹壁较为陡直，圈足较矮，足外壁向内斜收，足内壁向外斜撇，断面略呈三角形，足径较小。部分制品外壁有瓣面瘦长的莲瓣纹，瓣脊凸出明显，具有较强的浮雕感，全部采用垫烧。

在盘类当中，最多见者为斜腹圈足盘。此型盘盘壁斜敞，近底处明显折收，使内外壁底腹间形成一条清晰的分界线，圈足。主要根据圈足的变化，也可细分为三种不同形态。第一种圈足较高，足尖向外卷撇较甚，支烧；第二种足壁基本平直，支烧和垫烧共存；第三种圈足较低矮，足外壁向内斜收，足内壁向外斜撇，断面基本成三角形，皆系垫烧产品。上述圈足的三种不同形态，与敞口斜腹圈足碗相一致。

考古类型学的原理告诉我们，作为日常生活用器，其造型主要是由用途、制作技术、使用者的生活或生产环境、制作和使用者的心理情况或审美观念这些因素所决定的，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的产物。上述的几种因素总是综合为一种特定的力量，决定着物品的特定形态。在这些因素基本无变化的情况下，这种特定形态会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同样，随着上述诸因素的改变，物品的形态也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认为在上述敞口斜腹碗和斜腹盘中分别存在的三个不同形态，可能各自具备着不同的时间差异。而从器物形态上进行比较，它们又可构成该型碗、盘演变发展的序线。

汝窑是我国北宋时期的五大名窑之一，与官、钧、哥、定窑齐名。北宋晚期它在主要生产民用瓷的同时，曾为北宋宫廷烧制一部分御用瓷器。其窑址现已在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发现，经过调查试掘，陆续出土了一批官汝器实物标本。笔者注意观察了已公布的出土官汝器图文和照片，在碗、盘、洗类标本中，不但可以找到与乌龟山窑同型的器物，而且圈足向外卷撇基本上是他们的共有特征^⑤。《汝窑的发现》一书中汇集的三十五件现藏于国内外的官汝窑碗、盘、洗传世完整器，凡能观察到圈足者，向外卷撇的特征也普遍存在，拿乌龟山官窑中敞口斜腹碗和斜腹盘中的第一种形态与之比较，两者的形态极相类同。由此推定两者的生产时间可能比较接近。按文献记载，修内司官窑“袭故京遗制”，除了制作工艺外，形制特征当然也在所袭之列。而乌龟山官窑是继修内司窑之后别立的新窑，其早期产品和汝器的相似当在情理之中。

除了形制相似外，上述敞口斜腹撇足碗和斜腹撇足盘上普遍采用乳钉具支烧的办法，也与官汝器相同。文献记述汝器“有挣针状芝麻点。”传世的汝器中绝大部分留有支点痕迹，现见采集或出土的官汝瓷实物中，也“多裹足满釉支烧”，可见文献与实物是相吻合的，证明了官汝瓷主要采用支烧方法的事实。而且从支点形状和排列情况看，主要使用的也是一种带乳钉的圆饼形支具，与乌龟山所见者相同。很显然，乌龟山窑敞口斜腹撇足碗和斜腹撇足盘上采用的支烧方法，也可与官汝窑紧密联系。据此，我们推定敞口斜腹碗和斜腹盘中的第

一种撇足形态，是乌龟山官窑中的早期作品。

敞口斜腹碗和斜腹盘的第三种形态，在汝器中未能找到相同的实例，它与官汝器的形态特点相差较大，而且刮足垫烧的方法也与官汝器不一致，表明这种碗的生产时间距汝器可能较远，而在龙泉窑产品中，却可找到相似的器形。大量考古资料表明，龙泉窑曾生产过仿效乌龟山官窑的产品，在这种仿官作品中，不见乌龟山敞口斜腹碗和斜腹盘的第三种撇足形态，而常见一种敞口斜腹的小底碗，挖足较深，圈足断面呈三角形，口腹外壁多刻以半浮雕式瓣面瘦长的莲瓣，瓣脊凸出明显，浮雕感强，与乌龟山官窑敞口斜腹碗的第三种形态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且在采用刮足垫烧上两者也一致。在仿官作品的盘类器中，乌龟山所见斜腹盘中的第三种形态，也可找到相似的实例。依据地层和墓葬资料，龙泉这类仿官器的生产时间在南宋中晚期^⑥。由此推定，乌龟山官窑敞口斜腹碗和斜腹盘中的第三种形态，要晚于第一种形态，它们当系该窑的晚期作品。

依据上述的对比材料，我们可将乌龟山官窑敞口斜腹圈足碗和斜腹圈足盘的不同形态分别定为Ⅰ、Ⅱ、Ⅲ式，从而确定该型碗盘Ⅰ→Ⅱ→Ⅲ这样一个演变序列。

在其它如敞口弧腹圈足碗、敞口弧腹圈足盘等乌龟山官窑主要器型上，其圈足的形态和装烧方法均具有与上述敞口斜腹圈足碗和斜腹圈足盘相应的变异特点，我们同样可以官汝器和龙泉仿官器为对比参考材料，确立这些主要器型的演变序列。

在复原器和众多的残片中，属于上述各型碗盘的Ⅰ式标本，都属于一次釉支烧品，不见垫烧的多次釉标本，该式器物一般具有胎体略显厚重，形体较大的面貌特征。而Ⅲ式碗、盘则相反，它们全部是垫烧的多次釉制品，一次釉支烧品在该式碗盘上似已消声匿迹。而处在Ⅰ、Ⅲ式之间的Ⅱ式碗盘，则可见到两类制品共存的现象，它在形态上紧密连接于Ⅰ、Ⅲ式之间，明显地具有承前启后的特征。总之，从纵的方面看，一次釉产品处在型式序列之前，多次釉产品处在型式序列之后。从横的方面看，在各型碗盘的序列上，前面的都属于一次釉支烧品，后面的均系多次釉垫烧品。因此，型式序列上所呈现的客观迹象，比较清晰地反映了一次釉制品要早于多次釉制品。

对此，我们还可通过观察施釉工艺、装烧方法、器物形态特征变异的工艺因素等方面，进一步论证。据我国硅酸盐学者的研究，传统的高钙石灰釉直至北宋后期由于低钙高钾的石灰碱釉的烧制成功，方才获得根本性质的改变。这种石灰碱釉由于具有较强的耐高温性能，在高温煅烧过程中不会因熔化与胎分离而造成流釉现象，从而为增加青釉制品的釉层厚度，烧制如脂似玉的制品创造了先决条件。在陶瓷史上“莹润如堆脂”的乳浊釉，始烧于耀州窑、汝窑等北方诸窑。目前所见的出土或传世的官汝器实物标本，除了制作工整、工艺考究外，匀净淡雅的乳浊釉更是其显著特征。但从“断面观察，汝窑标本的釉层不厚。”^⑦迄今尚未发现多次釉的制作迹象与实物标本，表明官汝窑生产的是传统的一次釉制品，而反复素烧多次上釉的多次釉工艺，在官汝窑中尚未出现。同时也未见于同时代的其它北方民用瓷窑。

浙江青瓷，历来采用一次施釉工艺，除南宋官窑外，多次釉工艺直至南宋中期以后的龙泉窑仿官作品中才出现，其产生的时间无疑是在乌龟山官窑之后。在这种背景下，作为早期的乌龟山官窑，其产品“袭故京遗制”，生产与北宋官汝瓷相同的御用瓷器，应当是自然和合理的。因此，那类一次釉产品，从其素静淡雅的玉质感乳浊釉，到一次上釉的施釉工艺，都与官汝瓷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靖康之变”宋室南迁,同时带去一些北国的产品和技法,以及一些原来为王室烧造宫廷用瓷的名工巧匠。初定杭州后,王室就利用这些工匠建窑烧瓷,工匠们初到杭州仍习惯地延用他们原来所掌握的熟练技艺,烧造出与旧京官窑和官汝瓷相同的产品,来满足当时宫廷南迁后的急需。之后,随着宋、金割据局面的形成,江南获得相对安定,社会经济得到发展。南宋统治者开始满足于江南半壁河山,生活逐渐变得奢侈腐朽起来。“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⑨在这种情况下,宫廷对御用瓷器质量的要求也就与日俱增,必然对以满足统治者要求为唯一目的的官窑生产,提出创新的要求。官汝窑产品向以素静、淡雅和古朴为特点,不事繁纹缛饰,在质量上追求类玉的质感。此时又大量仿周汉青铜器生产观赏陈设瓷,更使这些瓷器超出了自身的使用价值而跻身于金银铜器的行列,达到了其他民用瓷窑无法相比的境地。然而,当时高粘度的石灰碱釉的创制成功,虽然为烧制具有乳油性类玉效果的厚釉青瓷创造了条件,但传统的一次施釉工艺又限制了釉层的增厚,也就限制了官窑器向类玉效果前进的步伐。因此,为进一步提高制品的类玉程度,提高其自身的品位,就必须在增加施釉次数上下功夫,改革一次施釉工艺。窑工们在一次施釉的基础上,经过反复实践和探索,创造了通过对坯体先反复低温素烧来增加施釉次数,避免釉层流离的新方法,达到增加青釉厚度,显示丰润釉色的目的,从而创造了多次釉新工艺,使官窑产品质量大为提高,在追求类玉效果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乌龟山窑一次釉产品普遍采用的支烧工艺,也可在官汝窑中找到渊源关系。据研究,采用包釉支烧的方法,并不始于汝窑,而在五代时北方的耀州窑和南方的岳州窑就已使用支钉包釉支烧。岳州窑的支钉较大而呈浑圆形,耀州瓷则较小而呈扁斜状。汝瓷支痕细小而规整的程度,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乌龟山官窑一次釉制品的生产,从普遍采用支烧工艺,到制作规整精细的乳钉状支具,都无异于官汝器,表明两者之间具有承继或影响关系,显示着乌龟山官窑中的一次釉支烧工艺要早于多次釉垫烧工艺的客观事实。

从一次施釉采用的支烧工艺到多次施釉采用的垫烧工艺,与施釉工艺的变革有着直接的内在联系,是施釉工艺变革后,装烧方法随之不得不作出相应调整的客观反映。由于一次釉制品胎壁,特别是底壁较厚,使用支钉具支装于外底,在高温煅烧过程中,平向底壁的机械强度足以承受器体的重量,一般不会产生器底变形和器身塌坍的残次现象。加之因釉层较薄,用细小而规整的支钉具支在上釉的外底部,烧成后支钉与瓷釉的粘结不深,易于取下,取下后留下的支痕显得较小。因此,在一次釉产品中,仍然沿用了官汝瓷的支烧方法。多次釉制品则不然,由于其胎骨极薄而施釉甚厚,有的甚至釉层厚于胎骨,如仍用支钉具支烧,不但极薄底壁的机械强度在高温煅烧过程中承受不住器体的重量而容易造成底壁内凸、腹壁下坍的残次现象,而且支钉尖埋于釉层内较深,烧成后不易取下,取下后留下的支钉疤痕大而明显,严重影响产品质量。在众多的出土物中,由于这两个原因所造成的废次品标本屡见不鲜。因此,当胎壁极薄的多次釉产品问世之后,传统的支烧方法也就必然相应改革而使用垫烧工艺。

事物的发展总有一个渐变的过程,瓷器生产也不例外。虽然在众多的多次釉标本中,也可见到少量可以用垫烧的碗、盘、洗类圈足器仍采用包釉支烧的方法,但从器物形态序列上进行观察,这些实物正处在早晚器物的中间形态,实际上属于一次釉向多次釉转化交叉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产物。

施釉工艺的变革导致了装烧方法的相应改变,而装烧方法的改变又对器物的造型特征产

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用支钉具支烧的一次釉产品，支钉支于外底，整个器体的重量集中于底壁，造型设计者采用将底壁加厚的办法来增加底壁的机械强度，避免在煨烧过程中产生塌坍和变形。因此，这些制品大多器底厚于器壁，在它们的底足断面上，大部分表现出足外壁高，足内壁低的状况。同时，由于此时的圈足在装烧时不着地而不起支撑器体的实际作用，又考虑到放置和起取圆饼形支钉具的方便，就往往将碗、盘、洗等器物的圈足制成外撇的形状。正是因为一次釉产品继承官汝器采用支烧方法，因此，反映在器形上两者也极相类同。随着多次釉制品的诞生而摒弃支烧改为垫烧之后，足尖直接置于垫具之上而起到了支撑器体的实际作用，此时的承重点集中于圈足和底足交接处，而不在平向的底壁，故设计者仅将圈足、底腹交接处器壁制厚，而底壁较原先减薄，厚度与腹壁相若或更薄，在底足断面上，大多表现出足内壁高于足外壁的特征，使器物更显得轻巧端正。同时，因此时的圈足在装烧时已起到了实际承重的作用，为避免在煨烧过程中圈足因受重压而产生变形塌坍的可能，就将原先外撇的圈足逐渐改为外壁向内斜收，内壁略向外撇，断面大体呈三角形的状况。从力学角度分析，即使在同样胎壁较薄的情况下，这种断面呈三角形的圈足较之向外卷撇的圈足，在承重上要优越得多。

综上所述，显而易见，如果把一次釉和多次釉两类工艺不同的制品，分别视作乌龟山官窑早晚不同时期的产品，那么官汝窑→（修内司窑）→郊坛下窑，从施釉工艺，到装烧方法，乃至器物造型，都可梳理出一条顺理成章的逻辑顺序，这一顺序显示了两宋官窑的发展脉络。

对龙泉仿官器的考察，可以从一个侧面为上述两类制品的早晚提供旁证。迄今见到的大量龙泉仿官器，厚釉垫烧是它们的共同特征。这类厚釉产品釉若堆脂，色似青玉，也是经反复素烧、多次上釉，然后再入窑煨烧的程序烧成，在工艺上与乌龟山官窑多次釉产品相一致。换言之，龙泉所仿者系乌龟山官窑中的多次釉制品，迄今为止，尚未发现仿烧一次釉支烧品的实例。在龙泉大量出土的窑具中，也不见乌龟山的那种支钉窑具。因此，对龙泉仿官器的考古学观察可以证明，当龙泉窑仿官之时，乌龟山官窑的产品已由一次釉支烧转向了多次釉垫烧。正如陶瓷专家汪庆正先生指出的那样，“从推理分析，南宋官窑的烧造工艺，早期应基本上承袭汴京官窑的制作，因此，修内司官窑和早期的郊坛下官窑应该仍主要是支烧，但在稍后时期，似乎摒弃支烧工艺而全部改为垫烧。假如事实确是如此，那么龙泉大窑、金村所烧的官窑器，其时代当在郊坛下窑的后期，即已由支烧改为垫烧工艺。”^⑩否则，龙泉窑只仿多次釉垫烧器，而不仿一次釉支烧品的现象，难以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三

以上分析表明，乌龟山官窑产品分为一次釉（早期）和多次釉（晚期）两个时期两种类型。一次釉和圈足包釉支烧是构成早期产品的两个主要特征。釉层相对较薄。对于碗、盘、洗、杯等小型圈足器，基本全部采用圈足包釉支烧的方法，外底可见支点痕迹。仅在罐、壶等形大体重的器物上采用垫烧。用以支烧的圆饼形支具，还往往印有“天、地、玄、黄”、“一、二、三、四……”等序数以及“玄”、“花”等字样。器类品种繁多，碗、盘、洗、杯、罐、盆等日用器占有很大比重，另也有一部分瓶、壶、炉、觚、簋、奩、鸟盏等陈设观赏用瓷。造型上表现为柔和流畅的廓线和刚劲明快的转折相结合。碗、盘、洗等器物圈足往往向外卷撇。青釉釉面晶莹类玉，并普遍布满裂纹。产品不事繁纹缛饰，以清静淡雅的素面

瓷为主，在少量碗、盘等器上可见刻划纹饰，而在瓶、壶、奩等器物上常施有凸起的弦纹数道。本期产品与北宋官汝器的胎釉特征、装烧方法及器物造型、装饰特点，都具有相通之处。晚期产品以多次釉和垫烧为主要特征。由于多次施釉，制品釉层甚厚而胎骨极薄，精细程度上较早期一次釉制品更胜一筹，在青釉晶莹类玉的质感上也强于早期一次釉制品，釉层的色调、质感和器物的造型，完美地凝聚在幽雅端庄、明快和谐的统一体之中。在装烧方法上，基本全部采用垫烧，器物大多具有“紫口铁足”的特征，只有少量无法垫烧的平底器仍采用早期的支烧方法。本期的产品种类与早期比，无大的变化，以小型器为多见，也颇有体形硕大的器物残片。在碗、盘、洗等类器物的圈足上，已改变了早期向外卷撇的造型，往往表现出外壁向内斜收、断面大体呈三角形的状况。而在制品普遍开片和基本以素面为主这两个特征上，则与早期相同。

概而言之，乌龟山官窑经历了一次釉→多次釉、支烧→垫烧、无紫口铁足→有紫口铁足这样的发展过程，产生这一发展过程的全部核心，是施釉工艺技术的变革。这一变革，体现了乌龟山官窑制瓷技术的精进和提高。如果说早期一次釉制品主要还是“袭故京遗制”的产物，那么晚期多次釉制品则有了质的升华，这是有别于北宋官汝窑的一项突破性创新，它使南宋官窑的制瓷技术达到了空前的境界，形成了自身的显著特色，在我国的青瓷生产史上树立了一块光辉灿烂的丰碑。

在目前所掌握的资料中，尚难找到多次釉制品始烧年代的确切依据，但龙泉仿官器生产时间的确定，对于解决这一问题无疑是有帮助的。根据浙江和其他地区目前已知的纪年墓资料，遂昌县庆元元年（公元1195年）墓中出土的还是龙泉窑厚胎薄釉腹部布满瓦纹的带盖太白坛，不见厚釉瓷。而在嘉定六年（公元1213年）的湖北省武昌市徐家山任晞晴墓中，则已出现龙泉窑仿官的厚釉青瓷瓶^⑩。丽水县保定二号合葬墓也出土粉青厚釉瓷两件，墓主分别死于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和宝庆二年（公元1226年）^⑪。其他出土的仿官器均为南宋晚期至宋末的制品。由此可以推定龙泉仿官窑的厚釉青瓷始烧年代应在公元1200年前后。这与文献记载也相吻合。如成书于南宋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的《云麓漫钞》中说：“青瓷器，皆出自李王，号秘色，又云出钱王。今处之龙溪出者色粉青，越乃艾色。”“处”即处州（今丽水）之简称，“龙溪”是龙泉境内的一条主要河流，今名龙泉溪，文中所说之粉青瓷，当指类似乌龟山后期作品的粉青色厚釉仿官器。因此，根据龙泉仿官器生产的时间可以推定，乌龟山官窑多次釉制品的产生时间约在南宋中期。

四

按照宋人《负暄杂录》和《坦斋笔衡》两书的记载，南宋官窑在郊坛下乌龟山窑之前，先有修内司窑的存在。而大凡后人对南宋官窑的研究，都将“紫口铁足”定为修内司官窑产品的主要特征。如明高濂《遵生八笺》云：“所谓官者，烧于宋修内司中，为官家造也。窑在杭之凤凰山下，其土紫，故紫色若铁，时云紫口铁足”^⑫。明曹仲明《格古要论》：“官窑器，宋修内司烧者，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紫口铁足，色好者与汝窑相类”^⑬。明王士性《广志绎》：“官、哥二窑，宋时烧之凤凰山下，紫口铁脚，……”^⑭。清蓝浦《景德镇陶录》：“唐肆肆考云：‘古龙泉器，色甚葱翠，妙者可与官、哥争艳，但少纹片，紫骨铁足耳’^⑮。”如前所述，在出土的大量乌龟山官窑实物中，我们可以见到一部分具有“紫口铁足”特征的产品，但有此特征的仅是多次釉垫烧品中的一部

分。在这些实物的观察中，我们可以知道，形成“紫口铁足”的原因，是由于胎土中氧化铁含量较高，经施釉烧后，胎呈深灰或灰黑色，口沿处釉汁流淌而隐现胎色，足尖部分因需垫烧而经刮釉处理，烧成中足尖表面在冷却时进行二次氧化，形成一圈比较规整的紫褐色，“紫口铁足”由此产生。可见，多次厚釉和垫烧是产生“紫口铁足”的两个主要条件。若前面对乌龟山官窑产品的分期能与客观事实相符，那么，具有“紫口铁足”特征的只是该窑的晚期作品，在其早期一次釉支烧品中，由于缺乏上述形成“紫口铁足”的两个主要条件，故不可能也确实没有产生“紫口铁足”之特征。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文献记载修内司官窑是先于乌龟山的第一座南宋官窑，其产品是“袭故京遗制”的。尽管至今该窑址仍下落不明，难以从地下出土的实物中窥见其庐山真面目，但从“袭故京遗制”的记载中，我们可以推知其产品必然与官汝器相同。现见出土和传世的官汝器实物标本，除系一次釉制品外，绝大部分是包釉支烧器，那么，在此种产品上，决无“紫口铁足”存在的可能；反之，如果修内司窑产品有“紫口铁足”，也就无所谓“袭故京遗制”了。再从顺理推论，在北宋官汝窑和乌龟山窑早期产品中均无“紫口铁足”特征的情况下，时间上处于两者之间的修内司窑，也不大可能烧造出具有“紫口铁足”特征的产品。因此，笔者认为，文献记述的“紫口铁足”器，其对象并非修内司窑产品，实际上是乌龟山官窑的晚期之作。

注释：

- ① 1956年发掘材料因故至今未能整理发表，本文讨论主要根据1985年发掘材料。
- ② 《三十年来浙江文物考古工作》，《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出版。
- ③ 临江城考古队《乌龟山南宋官窑发掘报告》，待刊。
- ④ 同②。
- ⑤ 上海博物馆汪庆正、范冬青、周丽丽著《汝窑的发现》，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宝丰清凉寺汝窑址的调查与试掘》，《文物》1989年11期；《宝丰县发现一批北宋汝官窑窖藏瓷器》，《中国文物报》1989年6月30日；《去年考古工作获得丰收》，《中国文物报》1990年1月4日。
- ⑥ 见本文第三节讨论。
- ⑦ 同⑤。
- ⑧ (宋)林升《题临安邸》，《宋诗纪事》卷五十六，樊榭山房本。
- ⑨ 汪庆正《汝窑的发现及其相关诸问题》，《中国古陶瓷研究》创刊号，紫禁城出版社出版。
- ⑩ 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武昌卓刀泉两座南宋墓葬的清理》，《考古》1964年第5期。
- ⑪ 瓯江文物工作组《丽水古墓发掘报告》，未刊。
- ⑫ (明)高濂《遵生八笺》卷十四《燕闲清论·论官哥窑器》。
- ⑬ (明)曹昭《格古要论》卷七《古窑器论·官窑》。
- ⑭ (明)王士性《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
- ⑮ (清)蓝浦《景德镇陶录》卷六《镇仿古窑考·龙泉窑》。

瓯窑探略

金柏东

温州是浙江最早生产青瓷的少数地区之一，因地处瓯江之滨，其地瓷窑古称“瓯窑”。调查材料表明，它创烧于东汉，结束于元代，制瓷历史长达一千三百多年。现已查明窑址多达二百处，有瓯窑瓷器陪葬的墓葬数以百计，其中纪年墓出土的或本身刻有铭文的瓷器，为我们判断瓯窑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基本特征与情况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阐明瓯窑的初始和发展演变过程及其特点，将有助于中国陶瓷史的研究。

一、瓯窑发展诸阶段

瓯窑从创始至衰落可分四个阶段：

（一）从原始瓷窑到东汉瓯窑

温州古称东瓯，最早的先民是“瓯越”人。瓯字从瓦，说明东瓯先民素来擅长制造陶瓷器物。近年来，瑞安岱石山、凤凰山，泰顺狮子岗、锦边山，苍南乌岩山，乐清白鹭屿和永嘉梅岙等处遗址或墓葬中均出土过商晚期、西周、春秋以至战国的原始黑瓷和原始青瓷，表明当时已能以瓷土做坯，外罩黑釉或青釉，烧制出原始瓷器。这些器物主要有罍、罐、鼎、豆、尊、盂等，胎质由粗而细，制作渐趋精良。永嘉小坟山、寮桥等地发现西汉烧制的原始瓷，残存器物堆积层相当丰厚。它以附近瓷石作原料，胎骨厚实坚韧，器物敷釉（部分釉不到底），釉层厚润，但不均匀，釉色有黄褐或青黄两种。器物多为罐、盆、罍、钵等，与温州市郊杨府山、瑞安桐溪等汉墓中出土的同类器物相符。

东汉中晚期，瓯瓷有了显著的进展，成功地从原始瓷向真正的瓷器迈进。当时已经普遍采用龙窑进行生产，而浙南各地又富有瓷土矿藏。（据研究，当时永嘉一带的瓷土， Al_2O_3 的含量比浙东上虞等地的稍高， Fe_2O_3 和 TiO_2 的含量比上虞的要低。因此，由于原料的差异，造成瓯窑和越窑瓷器制品的胎质和釉色不同。）这时窑址分布于瓯江下游北岸永嘉东岸芦湾的小坟山、箬隆后背山、罗溪芦田的殿岭山一带。产品分青瓷和黑瓷，前者胎骨白中偏灰，致密坚硬，烧结程度高，釉色淡青或青黄，釉质透明，色泽雅洁。后者敷黑色或稍带褐色釉，釉层不匀并有剥落。常见器物有：罍、罐、钵、壶、甗、盆、洗等。罐的种类较多，有直口、球腹的双系罐、四系泡菜罐等。这些器物的纹饰普遍使用方格纹、斜方格纹、米字纹、重线三角纹、水波纹、弦纹以及窗棂纹、卷草纹等，类似于原始瓷，甚至印纹硬陶。可见这时在纹饰上尚未形成瓷器本身独特的风格。应该着重指出：这些瓷器尽管还存在着原始瓷的某些缺陷，如坯体没有完全烧结，断面较粗，胎釉结合欠佳，釉色不稳定等，但它以高岭土做坯

体，以灰釉做罩釉，且经过高温焙烧，显然已开始成为真正的瓷器。

这一阶段历时千余年，各时期都有较为典型的器物，择要介绍以下几种：

1.商晚期至西周早中期的原始黑瓷：敞口、阔唇、折腹、内圈底尊；平唇、敛口、扁鼓腹、短矮喇叭形把豆。

2.春秋早中期的原始黑瓷：敛口、折肩浅腹、圆锥形三足鼎；敛口、鼓腹、平底，对称绳纹直系，肩腹间划饰水波纹的罐；敛口、浅腹、矮圈足盂。

3.春秋早中期的原始青瓷：敞口、浅腹，外撇矮圈足碗；敛口、扁鼓腹、外撇圈足盂。

4.战国时期的原始青瓷：敛口、尖唇、斜长颈、扁鼓腹、丰圈耳、平底匏壶；平口、外折沿、束颈、广腹罐。

5.汉代原始青瓷：敛口、阔唇、弧肩、平底罍；短直口、斜肩、扁圆腹、平底甗；短颈、溜肩、鼓腹、对称环形系，平底罐，以及整体呈葫芦形，上部作五个小罐，束腰处堆塑三熊的五罐瓶。

6.东汉晚期青瓷：敛口、浅腹、平底钵；近口处设弦纹，弦纹间饰水波纹，口微敛，上腹鼓起，下腹弧向内收至平底的碗；直口、折唇、直腹，下腹斜向内收的盆；罐分直口、折口、撇口三种，多作短颈、圆肩、鼓腹，双系或四系。

另外，此时期窑具有垫座、支座两种。垫座分二式：Ⅰ式，喇叭型，束腰处有对称穿孔以通火焰，瓷土制成；Ⅱ式，双足垫座，托面呈椭圆形，一侧下设双足，以适应龙窑窑床坡度，红粘土制成。支座二式：Ⅰ式，三足支钉，托面圆形，下设间距相等的圆锥形三足。瓷土制成；Ⅱ式，盂形齿沿支座，托面圆形，中开规整穿孔，下设齿状三足或五足。

（二）魏晋南北朝瓯窑

瓯窑制瓷技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已趋于成熟，并逐步达到繁盛。瓯窑在我国陶瓷史上享有盛誉的时期即是晋代，当时瓯窑产品种类丰富，地方特色明显，在造型和装饰工艺上均有长足进步。《景德镇陶录》云：“瓯，越也……自晋已陶，当时著尚”。西晋人杜毓在《荜赋》中也明确指出“器择陶拣，出自东瓯”，其时瓯窑瓷器曾运销到福建、广东和江苏等省，和越窑、婺州窑、德清窑相互竞争。该期窑址主要分布于瓯江支流楠溪江下游沿岸，在永嘉县罗溪夏麓山、东岸赤头山及瓯海县三垟樟岙岭脚等地，形成了一片窑址密集区。同时，在市郊杨府山、雨伞寺、永嘉罗浮、瑞安桐溪、苍南藻溪、平阳种玉及乐清竹屿等地的纪年墓中亦出土了这一时期的大量瓯窑器物。从窑址及纪年墓出土的器物来看，此期瓯窑器胎质坚硬细白，含铁量较越窑低，釉以淡青色为主，亦有部分青中泛黄者。除常见的盛器、食具、茶具壶、瓶、罐、钵、碗、碟、杯外，还有笔筒、砚台、水盂、榻、烛台、灯盏、洗、熏炉、唾壶、便壶以及陪葬明器井、谷仓、鸡圈、狗圈、鬼灶等。永嘉礁下山永和十年（354年）纪年墓出土的虎形器，虎背负竹节长管，昂首耸目、挺（突）胸卷尾，四爪紧抓地面，作伺机出击状。温州市双屿乡雨伞寺东晋升平三年（359年）纪年墓出土的牛形灯，灯柱作直立的牛形，牛头向前突出，后肢落地，在盘座与灯盏口之间按一个半环形把手。其它还有堆塑百戏的青瓷谷仓罐（见封三）；雌雄有别的鸡首对壶；昂首伏地的狮形烛台；器体肥胖、两侧划飞翼的虎形便壶和鼓腹蹲坐、股肌弹力内含、状似待捕飞坠昆虫的蛙形水盂等。它们形态逼真，式样优美，风格独特，均为难得的艺术品。在装饰花纹方面，三国西晋的瓯窑器物，纹饰应用不甚广泛，且较简单，主要在肩部或口沿仍划水波纹或压印斜方格纹、连珠纹，东晋时期上述纹饰渐少，出现莲瓣纹，并在南朝时普遍使用。在装饰手法方